

烟台市博物馆：文博聚力强阵地 赓续红心一脉承

梁雪



“烟博文化乡村行”活动

红色资源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近年来,烟台市博物馆走出了开辟“三力”教育阵地、赓续“红心”文脉传承这一党性教育新路径。依托主馆和胶东革命纪念馆特有的红色文化资源,紧密结合大众红色文化需求,以主馆“山海古韵”“世纪之路”、胶东革命纪念馆“英雄胶东”“奋发图强”“走向辉煌”三部分基本陈列以及各专题陈列为实景阵地,通过深入挖掘胶东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度阐释胶东百年革命史的时代价值,以“阵地资源”为纲要,以“活动服务”为指南,打造实景阵地、流动阵地、网络阵地“三力”党性教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胶东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以文博力量助推全市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依托两大场馆,在实景阵地中传播红色文化

坚持把党性教育开在展厅里。一方面,开展精准研究,明确教育“靶点”。通过对党史、胶东革命史等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推进文化优势深入运用,探索通过党性教育对胶东红色文化广泛、有效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推出系列展览,激发全域“活力”。联合胶东五市举办“伟大的历程——庆祝建党100周年胶东五市革命文物联展”,先后策划引进“探寻胶东红色根基——李卫国收藏革命文献展”“决胜脱贫,共奔小康”资料展“我们的70年——新中国成立后烟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清廉传世——烟台廉洁文化展”“中共山东百年历史图片展”等一批优秀的红色主题展览。

坚持将党性教育融入讲解中。一方面,用好“红色队伍”,强化教育效能。推出“青年党员讲红展”活动,充分调动积极性,安排青年党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投身讲解服务,以“情”育人,通过现场讲解的历练,多名成员荣获中央宣传部优秀讲解员、山东省“专业金牌讲解员”、山东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等荣誉称号。另一方面,讲好“红色故事”,丰富教育内容。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和生动通俗的语言,将“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玉皇顶武装起义、“大参军、大支前、大调干、大运兵”,密送黄金、北海银行、西海地下医院、胶东兵工等革命事件展现在世人面前;将烟台土地改革,“北极星”钟表、张裕酿酒公司等代表企业和铁柱子王永幸、知识青年榜样徐建春等劳模人物拼搏向前、艰苦奋斗的精神生动呈现,不断传承胶东人民“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让红色岁月永不褪色,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坚持以党性教育提振工作力。持续以工作提升作为检验党性教育成果的关键,形成一批高质量成果。“伟大的历程——庆祝建党100周年胶东五市革命文物联展”入选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推介名单”,“探寻胶东红色根基——李卫国收藏革命文献展”入选山东省文旅厅“庆祝建党100周年100家革命场馆特色展陈推介名单”,“我们的70年——新中国成立后烟台社会的发展和

与变迁”展览荣获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清廉传世——烟台廉洁文化展”实现了“博物馆+”跨界融合,展出与“廉”有关的古代文物、非遗艺术品和各种书籍120余,彰显了烟台从古至今的廉洁文化。馆内多名青年党员荣获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烟台市巾帼岗位能手、烟台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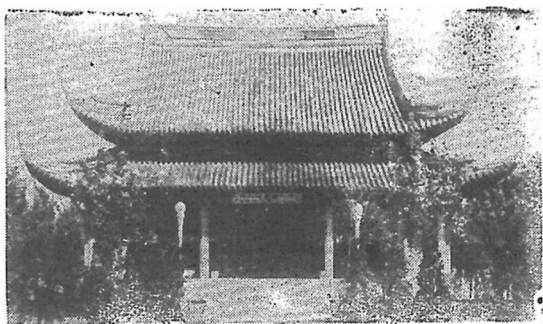
打造行走课堂,在流动阵地中擦亮教育品牌

开展馆地合作,让文化教育凝聚魂气。以胶东革命史为主要内容,以“五送六进”文化惠民工程和“三关四爱”文化暖心工程为载体,举办“光辉的历程——喜迎二十大党史图片展”“星火燎原”“抗日风云”等流动展览,开展“传承·追梦”——胶东红色文化主题宣讲以及“猎猎军旗扬”文化拥军、“革命精神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近年来,走进50多个社区、部队、学校和企业开展讲座、宣讲,覆盖10万余人,用“大众话”在全社会厚植爱国爱党的高尚情怀。“薪火相传·童心向党——传承追梦”服务项目荣获“红色旅游进校园”案例优秀作品征集展示活动优秀案例。

烹制红色套餐,为乡村振兴提鲜增味。一方面,让乡村文化“红起来”。依托驻地第一书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队等桥梁,积极与福山区、海阳市、蓬莱区有关镇村开展支部共建活动,整合力量、因地制宜开展“文化赶大集”“文化乡村行”等主题活动10余次。此外,高标准完成红色文博轻骑兵“我为革命老区乡村代言”工作,平均每年完成10余个乡村代言视频拍摄,为烟台市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注入了更加生动多彩的内容与形式,助推红色基因特色村实现文化振兴。另一方面,让乡村阵地“强起来”。建立红色教育教学点,定期开展双向服务,为当地干部和农村党员送上精彩的红色展览和胶东革命史讲座,让文物和红色故事融入乡村,引导党员干部群众凝聚正能量。烟台市博物馆“‘烟台红色文博轻骑兵’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案例被评为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

民国乡土教材里的文物课程

史勇



乡土教材里的上海文庙旧影

教材》(供本校高年级试用)收录文天祥祠、陆秀夫祠墓、南澳岛郑成功军队炮垒遗迹、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遗址等。

短文式夹叙夹议。1946年版《广东省乡土教材》(小学中年级适用)收录广州白云山能仁、月溪、濂泉、涌洞、景泰等寺,介绍概况的同时指出“但经此次抗战已经破坏不堪了”;通过简介粤东山镇海楼、潮州韩文公祠、海南苏东坡庙、惠州西湖东坡亭等,“可见中原文化之南渐”;通过简介六榕寺、花塔、光塔、石室,强调“这些都可以看到本省过去受海外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游山揽胜,其实也可以说正在考察文化的迹象呢”。1945年版上海小学常识科补充读物《乡土教材》中级第三、四册(四年级上、下学期适用)和高级第三册(五年级上学期适用)相关课文,多以教师引导学生或家长陪伴孩子(角色设计为父亲和名为振华的男孩)实地参观文物古迹(博物馆)的视角,以新颖的代入式或沉浸式叙事手法,不仅介绍龙华寺、静安寺、城隍庙、文庙等传统古迹,而且注意到近现代史迹,如吴淞口炮台重要位置及其在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故居及相关纪念物等。相较于其他地区乡土教材,沪版乡土教材比较重视博物馆课程设置,如《两个博物院》一文即以父子问答形式介绍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的特色藏品。

值得一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怒潮编著之《抗敌教材》(上中下三卷),“以强调抗敌情绪、激发爱国思想、提高保卫国土观念、增进复兴民族意识为旨趣”,供初中、简师、初级职校及各短期民众军事训练班国文史地补充读物之用。该套教材上卷收录《卢沟桥》《北平的胜迹》《神圣的陵园》(介绍明孝陵、中山陵、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等课文,中卷收录《娘子关》(介绍娘子关、井陉关和固关长城)《古战场》(介绍归绥受降城、王昭君青冢)《圣人的故乡》(介绍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等课文,下卷收录《雄关四塞的国防重镇》(介绍函谷关、萧关、武关和散关)《昆明池畔的胜地》(介绍昆明池及昆明周边文物古迹)等课文。由于其收录之文物并不局限于一省一地,涵

建强战斗堡垒,在工作一线凝魂促干。搭建“工地党课”“情景党课”“故事党课”,坚持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阵地,定期举办“思享汇”红色沙龙、工地党课宣讲、红色故事分享等活动,保证了长期在外考古党员开展组织生活,让党员在一线补“钙”,激励党员在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时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依托考古工地、普及文物保护及公共考古知识,宣传文物法律法规,成功举办“黄水河畔考古记——蓬莱炉上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现场直播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拓展服务空间,在网络阵地中弘扬革命精神

打造特色线上宣教品牌。利用馆内志愿者力量,推出志愿者文博特色品牌“童声歌颂党”,开发沉浸式AR研学系统,配合线下“我是小小讲解员”服务品牌,聚焦文博历史,定格胶东革命史,以青少年文明志愿服务正面形象“立体式”感召社会正能量,传承红色基因。多年来,共培训小讲解员志愿者400余名。

不断创新党性教育形式。充分利用文旅云平台,以学习党史、胶东革命史为重点,结合文博业务,举办“党课开讲了”“革命后代话传承”系列讲座、“庆七一·七馆讲解员线上讲解胶东红色故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红色十月·诗意中国”朗诵会等100余场线上活动。联合共青团烟台市委、烟台市少工委、烟台市学生联合会举办了全市青少年清明祭英烈网络寄语活动,点击率突破105万。

大力开展线上宣教突破。以馆藏红色文物为依托,充分利用数字化项目成果,推出“3D看文物”指尖上的展览”“讲解员讲文物”等100余期线上系列活动,精选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专题连载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推广。借助VR技术,开展线上“烟台廉洁文化展”,制作“龙泉窑青釉划花公道杯”等6件展品的赏析视频,与观众一同追寻胶东红色记忆,聆听胶东新潮故事。为真正让文物说话,联合烟台电视台推出了“筑梦山海——走进烟台市博物馆”融媒体节目——“听文物说话”,得到广大市民广泛好评。

通过不断探索实践,烟台市博物馆的党性教育工作更加注重“烟火气”。强调文博工作贴近日常生活,提供接地气、受欢迎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讲“百姓话”,在全社会厚植爱党爱国的高尚情怀,推动红色文化直达广大群众的心底,真正实现党性教育“随时随地、无处不在”。更加注重“互动性”。互动体验本身的魅力在于通过各种艺术元素的交错,带给观众视觉体验和听觉体验,通过体验活动增强博物馆与受众的亲近感,让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见解的人群进行红色文化交流,让党性教育活起来。更加注重“资源库”。开展党性教育要注重做好融入文章,通过创新党员教育课程内容、形式载体,巧妙地将地方特色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髓融入党性教育中,不断增强党性教学活动的魅力,真正让党员群众沉浸其中、接受教育。

盖了华北、华东、东南、西南、西北各地体现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底蕴和反映不屈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文物古迹,因此可将其视为抗战初期全国通用之史地类乡土教材,亦为民国乡土教材特例。

民国时期相关乡土教材在文物古迹课文之后往往附有注释。如《首都乡土研究》文物古迹相关各节注释累计多达40余条,篇幅甚至超过正文,信息量极大。陕西省《社会科乡土教材》每个文物词条后均对涉及人物、事件详细注释,以利于学生理解相关古迹历史背景和扩大知识面。就文物方面的课后作业题而言,民国乡土教材更是体现了“知行合一”理念。陕西省《社会科乡土教材》每个文物词条后均附有多道思考题,福建省立福州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编印之《我校的乡土教育》(1935年版),提出了包括福州有几座大庙宇、七塔散布在福州什么地方、古物保存所在何处及所藏古物等23个研究问题;课后实践作业包括搜集风景片、地图、记载、古物,调查并制作本地名胜古迹周边交通情形及与本校距离一览表,绘制本地名胜古迹分布地图,赴寺塔庙宇开展古物写生活动、用粘土制作福州白塔(定光塔)及乡贤祠建筑模型等,可谓手脑并用。沪版小学中高级《乡土教材》文物课程课后作业与之相似,一方面要求学生思考并回答“利用祠庙作为公共游览场所何意义?”“上海著名博物院有几个?”“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以收藏哪些东西为主?”“震旦博物院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实地参观后手绘吴淞口炮台形势图,参观文庙公园和城隍庙市场后统计城隍庙市场店铺种类,参观静安寺后做一篇游记,同时调查记录学校附近的纪念建筑。《广东省乡土教材》课后思考题之一要求学生写出本县名胜古迹名称及所在地。《云县乡土教材》课后作业包括回答“神丹古渡因何得名?”“庆云桥修建于何时?”“县境内土司衙门旧址有何处并列举之”等问题。《修订昆明县小学乡土教材》课后思考题除了回答本乡有无古迹、学生各就所知指出课文未涉及之家乡古迹等常规问题外,还上升到研讨古迹应该怎样保存这样的思辨高度。

回顾文物知识进课堂的这段历史往事,课程设置特别是课后作业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今日乡土教材编写和文物知识普及亦具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受限于时代环境与客观条件,民国乡土教材文物课程编纂主体多为学校和教师,文物工作者鲜有参与其事;文物考古调查研究成果在课文内容中运用较少。李济先生曾指出民国时期“有胆量的教科书编者,已敢用考古创造的名词了”(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但就中小学乡土教材而言,绝大多数涉及文物古迹的内容及注释仍然多选自历史文献。它们的不足与价值相较,只能说瑕瑜互见。今天的历史类乡土教材中,这些短板或空白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弥补,殊可告慰贤贤。

中国水下考古探测装备的发展

黄泽鹏



“南海1号”沉船沉箱整体打捞现场

中国水下考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步以来,经历了从依赖进口设备到国产设备自主创新,从浅海走向深海的伟大跨越。早期水下考古人员利用侧扫声呐、磁力仪等传统海洋地球物理探测仪器,开启了在辽阔海域中寻找水下文化遗产的探索之旅;而后,随着国产多波束测深系统、浅地层剖面仪、水下机器人等装备的不断更新和应用,多项技术融合使得水下考古探测工作从粗放式摸索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系统作业。

早期水下考古探测装备的起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中国的水下考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步,当时国内缺乏自主的水下探测技术装备,只能依赖国外进口仪器或对现有设备进行简单改装使用。由于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早期的水下考古工作充满挑战,很大程度上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在能见度低、海况多变的近海水域,考古人员主要借助侧扫声呐、海洋磁力仪和浅地层剖面仪等探测设备,以期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沉船等遗迹,这些先进装备的引入,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大海捞针”式的被动局面。例如,多波束测深和侧扫声呐可以获取海底地形地貌和水下遗迹的声学图像;磁力仪能够捕捉海底铁器文物等引起的微弱磁场异常;浅地层剖面仪则向海底发射声波探测海底浅层结构,用于发现埋藏于海床表面以下的文物线索。这些设备在当时主要依赖国外技术,引进之后用于水下考古前期物探调查。

依托上述探测手段,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取得了划时代的发现。1987年,广州打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时,却意外在声学回波图像中发现了另一处沉船异常点,经水下考古潜水调查验证竟是一条宋代古沉船,即著名的“南海1号”。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的首次重大收获,也让考古工作者意识到科技探测的巨大威力。“南海1号”的发现得益于侧扫声呐在海底反映出的清晰轮廓,随后还辅以磁力仪对周边海域进行加密探测,进一步确认了遗址位置。当时我国尚无成熟的专业水下考古队伍,只能借助国内海洋科研院所和西方人员的经验来操作这些设备。虽然起步阶段装备简陋、经验不足,但通过“南海1号”的案例,中国考古人员初步掌握了使用声学等物探手段发现水下遗迹的方法。此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将多种物探技术结合应用于水下考古调查。例如1991年在辽宁海域,就首次整合使用了侧扫声呐、测深仪、浅地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多种探测方法来寻找古代沉船,获取了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勘测范围内的海底地形地貌微观资料和沉船埋藏的可疑位置。此次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是首次全部由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独立完成,从调查定位到水下发掘使用了大量海洋科技手段,不仅锻炼了我国水下考古的人员队伍,也摸索尝试了适合我国海洋环境(能见度不良、潮汐变化复杂、地质结构变化大等)的水下工作模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重要水下文化遗存相继浮现,如1996年在西沙群岛发现了“华光礁一号”沉船,水下考古人员于1998至1999年对其进行了初步调查和试掘,为远海水下考古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艰难起步,在不断学习国外技术的过程中摸索前行。

技术国产化与多技术融合(二十一世纪约前二十年)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力度,各类探测装备开始走上国产化和多技术融合的道路。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着手研制自主的水下声呐系统,逐步改变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例如,国产多波束测深系统和侧扫声呐系统被应用于近海考古调查,考古人员在沿海开展大范围探测时,往往先利用多波束来全面了解海底地貌,再用侧扫声呐精细扫描可疑区域的异常回波。对于重点海域,还会利用浅地层剖面仪探埋藏层的堆积情况,必要时使用磁力仪搜索海床下的金属异常信号。这种多种技术手段融合的探测模式,使考古调查由浅海向深海拓展成为可能。2007年,在广东汕头市南澳岛东南海域,通过前期线索和利用上述综

合探测手段发现了一处明代古沉船遗址,即“南澳一号”。该发现是我国自主开展水下考古调查的重要范例,它不仅使用了国产装备,还动用了考古、打捞等多学科团队协作。与此同时,我国也在尝试将小型水下机器人用于水下遗产调查,为后来更先进的载人深潜器积累了经验。虽然在二十一世纪约前二十年,载人深潜器更多用于科研试验,但水下考古领域已经开始受益于机器人技术的加入。在能见度差、深度大的水域,小型水下机器人可以代替潜水员完成长时间的观测工作,大大提高了作业安全性和效率。除了探测和作业装备的提升,数字成像技术也在这一阶段融入了水下考古。三维成像手段的引入让海底遗迹的记录更加精确、生动。比如利用多波束测深获取沉船遗址的高精度三维地形模型,结合水下三维摄影测量技术,可以生成沉船及其周边遗物的数字化三维图像。在近岸水下遗址,考古人员还尝试使用水下激光扫描仪,对沉船构件进行精密测绘。这些技术在“南海1号”整体打捞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多波束声呐精确描绘出古船埋藏在海底的姿态和周边地形,为设计钢沉箱整体打捞方案提供了依据。2007年,“南海1号”沉船连同数以万计的文物在巨型钢制沉箱的包裹下整体起吊出水,国际水下考古权威专家乔治·巴斯认为如此大规模且保存完好的整体打捞在世界尚属首次,并赞叹道:“这只能在中国发生!”另一方面,相较于整体打捞,考古界也日益强调原地保护和最小干预原则。比如对“南澳一号”沉船,考古人员是将文物提取出水后,在海底搭建了大型金属框架将船体原地罩护,以尽量避免扰动遗址。这一做法体现了当代水下考古在技术与保护理念上的平衡。

从“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到“南澳一号”的原址保护,二十一世纪约前二十年的中国水下考古实现了技术上的自主突破和方法上的多样化整合,逐步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未来发展趋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水下考古的足迹正从近海浅海迈向广袤的深海大洋。2022年,在南海西北陆坡水深约1500米的海底发现了两处明代沉船遗址。深蓝之下,中国考古学家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世界深海考古的最前沿。

面对不断延伸的考古边界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中国水下考古探测正在迎来新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伴随诸多挑战。首先,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着计算机图像识别和大数据处理能力